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编者按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着不用讲“三驾马车”了？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在

对话中,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精神进行了全面阐释与解读。

最近一段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备受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点部署,将其表述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理念和若干重要规划建议,本质上体现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思想。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着不用讲“三驾马车”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就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记者:这些年各方面对需求侧关注得多一些。此次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出于什么现实考量?需求侧改革的边际效益、扩大内需的实际效果在递减?

张卓元:中央此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的对症“药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前我们曾为解决产能过剩等供给方面的问题,提出过一些方案,但真正上升到供给侧改革层面,并下决心解决供给侧问题,还是头一次。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对我国来说,新的形势是什么?从国内来说,首先一条应该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了。现在一些城市的雾霾很严重,把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搞苦了。罪魁祸首是谁呢?说到底还是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来,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向绿色要生产力。从国际优势比较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弱,是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德国等都在布局高端制造业,抢占科技制高点。我们要占据主动也要把劲儿用在这些方面。从世界趋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也愈发体现在知识、创新的竞争上。知识、创新主要是针对供给侧的。对企业来说,只有产品质量过硬、效率提高,才能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

供给侧改革还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些年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但并不是说所有产能都过剩,一些高端产能,比如集成电路、发动机等,我们短缺得很,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叶轮等零部件我们还需

要进口。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是同时并存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供给侧想办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国供给体系未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作出及时调整,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拦路虎”。过去的供给体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现在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了,但供给没有跟上变化,产品的品质、品种、规格、安全性等远远满足不了变化了的消费需求。这也是近些年“海淘热”涌现的深层原因。这是消费方面的。再看投资,有些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饱和峰值,像以往那样继续投会给经济造成很多问题。就出口而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明显减少,迫切需要供给体系作出改变。现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与其说是周期性原因,不如说主要是结构性原因,即结构性失衡尤其是供给侧结构失衡造成的。

从现实政策选择来说,供给侧改革也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正如你所说,过去我们对需求侧关注得多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侧改革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以往我们也曾遇到经济下行,多增加点投资,问题就解决了。如今情况却更复杂了,一大笔钱投下去,促进经济增长的动静不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显然不行了。把改革的主攻点放到供给侧上,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能更好地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当然,讲供给侧不是说不重视需求侧了,供给与需求两手都得抓。

记者:我国供给体制主要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如何改?

张卓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国供给体制和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产能过剩是当前供给侧的最大“痼疾”。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家电等的过剩尤为严重。产能过剩不可小觑,“吨钢利润不如一斤猪肉”就是对这种过剩后果的一种描述。一些人担心,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将中国带入“铁锈时代”。“铁锈时代”是对部分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产能过剩导致厂房闲置、设备锈迹斑斑的一种形象说法。

房地产高库存是供给侧另一个大“痛点”。据有关方面调研,我国人均住房消费水平已超中低收入国家,不少二、三线城市商品房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有的楼盘已经积压二三年卖不掉。随着各地楼市周期性调整,库存压力还

有加大的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而上年同期不足6亿平方米,一年陡增过亿平方米。房地产是关联性巨大的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房地产库存长期高企,不仅会伤及整个市场,还会直接影响钢铁、水泥、装潢等众多相关行业发展。如果处置不当,更会为金融风险埋下“种子”。

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好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去库存,光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供给一侧发力,使农民工和有改善需求的城乡居民形成在城镇买房和长期租房的预期。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也好,去库存也罢,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

记者:高成本是供给侧的致命伤。如何看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来解决?

张卓元:企业成本高是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降低企业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水等成本呈现趋势性上升上,而且表现在融资、流通等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还表现在一些隐性收费项目屡禁不止上。前不久,一个朋友家的孩子谈办企业感受,总体上还是认为现在企业负担有些重,一些窗口部门办事人员甚至故意难为企业,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在经济上行周期、市场环境好,成本高一点低一点,企业还可以忍受。但现在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又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过高的成本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拉弗曲线”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超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我们一定要认识并不是税率高税收就一定多

这个道理。

降低企业成本,要多管齐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哪些原则?注意些什么?

张卓元:除了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等大的原则外,起码还要注意两点:

一是难度很大。目前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都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就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息息相关。比如去产能,势必涉及企业的重组甚至破产,会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一下子步子迈得过大,某些方面可能承受不了,要妥善处理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二是尽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加快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一些自然垄断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表明,完善公有制经济,允许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三十多年平均达到近两位数,在此基础上,不仅国有资本成倍大幅度增长,各种民间资本和居民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新增长点多了,就可以对冲一下主动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有哪些相关改革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张卓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一轮时间较长的繁荣,创造了低通货膨胀率、低赤字、低失业率的“三低”奇迹,并最终出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不少理论分析都认为,为美国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前总统里根。里根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我国的启示就是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企业减负工作,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

文/本报记者 马志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认识供给侧改革

简新华 余江

当前,如何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应该运用什么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势、提出合理的应对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指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势。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借鉴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和需求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状况和走势,相应提出需求管理的应对之策,这种做法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只重视总量平衡,忽视结构合理优化;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剖析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需求管理,轻视供给管理。开出的药方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奏效,不能长期见效,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可能陷入“滞涨并发症”。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20年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凯恩斯也被尊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滞涨”的泥潭,患上了以前没有的“摩登病”,凯恩斯主义也陷入了“破产”境地。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部分学者提出,需求分析只是总量、短期分析,有局限性,已经不行了或者不够了,需求管理也难见成效,而供给分析是结构、长期分析,更重要、更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主张转向借鉴“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论,采用供给分析方法,提出供给管理对策,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提高质量和效益。应该说这种看法和主张是有价值的,对于克服以往的片面性也是有帮助的。但也需要避免完全照搬照抄,比如,照搬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只重视供给、结构分析,忽视需求、总量分析;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药方否定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开出的药方同样只治标不治本。里根经济学的实践结果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里根经济学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两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和高速增长)的所谓“新经济”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但是2008年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而且,在借鉴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实际上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总量、结构、长短期问题,比如,有总需求,也有总供给;有由不同要素与不同产品和劳务构成的供给结构,也有由“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结构;有长短期的供给,也有长短期的需求。所以认为需求只是总量、短期、经济周期问题,供给才是结构、长期问题的看法,存在片面性,不符合实际。尽管供给更多涉及长期、结构、质量、效益问题,需求更多涉及短期、总量、烫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但是不能由此断言供给比需求更重要。的确,供给在一定情况下虽然可以创造新需求,但是总的来说需求是目的,供给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供给是为需求服务的。如果需求不足,即使供给改善,经济仍然难以增长。正是由于发明和生产出了手机,所以才产生了对手机的需求,表面上看好像是供给能够完全独立地创造需求,实际上最终还是因为人们有更快更方便更好地传递信息的需求,而手机正好能满足这种需求。市场经济是依靠有购买力的需求推动的经济,总体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需求的主要不是供给,而是购买力即收入。

供求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分析供求,与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不同在于,不是单方面分析或强调需求或者供给,而是在分别分析需求和供给的同时,更重点综合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不只是分析经济现象,更深入揭示问题的实质;不只是分析供求的现状表现及其直接原因,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关系状况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不只是片面强调需求管理或者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更重视的是相关制度变革和创新。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主张,才可能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符合实际、更科学的结论,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

因此,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都有局限性,都只能参考借鉴,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现在的改革和发展。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要坚持、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改革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实际上却在碰到经济问题时,只是到西方经济学中找工具、方法,只是搬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和说明中国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量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里根经济学”的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采用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从供给和需求的状况特别是相互关系及其制度根源上进行综合分析。

本版编辑 裴珍珍 孙昌岳

供给侧改革需打通要素流动通道

刘世锦

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

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巨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

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树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大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克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作者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观察

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持续的负增长。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